

的一个女兵 的西藏人生



李国柱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

李国柱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李国柱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3
ISBN 978 - 7 - 80253 - 247 - 2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276 号

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

作 者 李国柱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342 千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47 - 2/I · 96

定 价:35.00 元

序一

割不断的情缘 看不够的画卷

——为李国柱同志《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而作

拉巴平措

李国柱同志把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和作品汇集成册，准备出版，约我撰写序言。我欣然从命。这是因为她和她的战友们在我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为我家乡的发展和进步付出了心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我和我的老乡们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就是从她和她的战友们的形象和言谈举止开始的。他们是我和家乡父老乡亲十分敬重的老同志、老前辈，是人们常常以敬佩的口吻提起的“老西藏”，是我和我的同辈们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和指路人。

首先，我认识李国柱同志是通过阴法唐同志认识的。因为法唐同志是当时驻守江孜的解放军当中最大的“本布啦”（官员），而李国柱同志是法唐同志的夫人。在江孜所有重大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话语，感受到他们的风采。

其次，我认识李国柱同志是通过我家主人吉普老爷和夫人认识的。因为李国柱同志当时做统战、妇女工作，经常出入于吉普先生的住宅，同吉普先生和夫人在一起。我作为吉普家的百姓，住在吉普府邸隔壁，经常在老爷家当差，所以见到他们的机会较多。

再次，江孜人认识 and 了解李国柱同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而且是地道的江孜方言。





当时，解放军“本布啦”学藏语、说藏语蔚然成风。长期以来，李国柱同志只要是跟藏族同志打交道，一定用藏语交谈，到现在都是如此，十分自然，十分有亲和力。

除了情谊之外，我应约欣然写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尽管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系统的回忆录，但却真实地记录了近六十年来我的家乡——江孜这个古老城市以及整个西藏的种种往事。她把包括抗英故事在内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青藏高原所发生的许多故事汇集起来，让我们仔细品味。其中包括我家的老爷吉普及其家人的故事、解放军进驻江孜前后的故事、江孜成立《十七条协议》学习委员会的故事、1954年江孜暴发洪水以及救灾的故事、江孜成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的故事、1957年头人本根却珠毒打农奴旺杰平措的故事、江孜民主改革的故事、女活佛的故事、“一江两河”的故事，等等。本书的特点是：一、所写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而不是文学创作，真实可靠；二、文章前后连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三、很多文章虽然篇幅短小，所写事情不大，但对认识当时西藏大背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读到这些故事，我仿佛看到历史画卷，一幅幅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眼前，令我心潮澎湃；一个个历史人物栩栩如生，令我倍感亲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在这片热土上“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人们肃然起敬，对我的父老乡亲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冲出黑夜、走向光明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敬佩，也勾起了我对包括我家吉普老爷和夫人在内的开明人士与时俱进精神的由衷感佩！

本书不仅真实记录了西藏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广泛记述了这一时期西藏文化深刻而巨大的变迁，藏族传统文化是怎样得到广泛继承和发扬的。比如李国柱等同志学习藏语文，他们两口子穿藏装的故事，等等。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藏族中青年人刻苦学习汉语文，不懂拼音字母，就用藏文标记汉语发音。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民主、自由、科学的





思想深入人心，革命、人民、翻身、解放等词汇成为时代最强音；新的社会组织大量出现，比如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十七条协议》委员会、互助组等；制度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在政治上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开展了普选和民主选举，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基巧（地区）办事处、地区分工委，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各级人民政府，等等；在经济上，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分到农奴手中，做到了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消除了产生人头税、乌拉差役、高利贷等的剥削制度，出现了公路交通、汽车运输，修建起机场、开辟了航线，等等；在社会文化领域，创建现代学校、医院、广播、报纸，普及电影，开展体育活动，等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如一妻多夫制度受到挑战，妇女节、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饮食习惯中增加了馒头、米饭、炒菜等，在服饰装束中出现了中山装、西装革履，还有剪辫子、理头发，等等。总之，这个时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新旧观念、藏汉文化大交流、大交融的时期，是藏族文化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也是藏族现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诉说着西藏文化的变迁。

新西藏，新景象，新文化，新风俗。这是无数像李国柱同志一样的汉族同志和我的父老乡亲一样的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同志共同造就的。西藏人民将在这一伟大征程上继续前行，续写辉煌。

2010年1月



序二

六十载，激情飞扬的西藏情怀

阴法唐

今年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50 周年，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已近 60 年，全国各地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回顾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感慨又欣慰。

恰在此时，李国柱同志这本《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交付出版，为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提供了资料。巧合的是，这本书完稿的时间，也正好是国柱同志参加革命 60 年。我很欣喜地翻阅了这本书的手稿，感到语言纯朴自然，事例生动亲切感人，带我重新回到当年的岁月。

国柱同志在书中忠实地记载了她自 1950 年参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及后来的西藏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情况及生动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勾画出了她精彩的几十年西藏革命和工作的人生经历。

在世人看来，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拥有神奇壮丽的雪山景色，具有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令人无比向往。今天，如要去那里，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坐飞机，可以乘火车，也可以坐汽车。而 60 年前，从四川通过康区进西藏，在 2000 多公里的路途中，要跨过地形奇特的横断山脉，攀越重重终年积雪的高山，蹚过条条峭壁夹岸的激流，涉过人烟稀少的草地，经受令人窒息的稀薄空气。





当年，在第一批进藏部队的行列中，有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她们是 1100 多人的年轻女兵。虽然在进藏部队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因进藏途中情况复杂，条件太差，补给特别困难，因而她们大都超负荷负重，要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蹚冰河，披荆斩棘，风餐露宿，这对有各种特殊情况的年轻女兵们来说，实属难上加难。但她们硬是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解放西藏人民、保卫祖国边防的献身精神，背起背包，踏上征途，跨越这条自古就被商旅和兵家视为畏途的康藏古道，徒步跋涉两三千公里到达西藏各国防要地。

国柱同志就是这个让世人惊叹的英雄群体中的一员。在进军西藏初期，以战促和的昌都战役中，她是康藏工作队（由 30 多名女兵组成）的队员，担负赶牦牛驮运银元、粮食等物资的任务。在横断山脉，她和战友们顶风冒雪，顽强拼搏，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部队胜利进军西藏特别是昌都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 年，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成立。国柱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来调到江孜分工委，先到社会部，又到统战部，还在政研室工作过。在统战部工作时，负责上层妇女统战工作。她克服工作经验不足等困难，积极想办法了解西藏的情况，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如何同西藏上层打交道，以团结、争取爱国人士包括学习如何与核心反动人物作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等。边工作，边学习，边摸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从开始经常出差错，工作被动，到逐渐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独自完成任务，胜任了本职工作。通过长期与江孜上中层妇女共同学习、一起进行各种政治和文艺等活动，合作共事，争取团结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与她无话不说，成为好友，有的至今还经常保持联系。

熟悉藏语是在西藏做好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和农村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国柱同志也是从最初的不懂不会，工作需要配翻译，到后来能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同藏族同志交流，为不懂藏语





的同志做翻译，以至于不熟悉她的人一听她说话还以为她是地地道道的拉萨藏族。在工作实践中，国柱同志深深体会到不会藏语的难处，所以下决心攻克藏语关。为了学好藏语，她随身装着小本本，做学习的有心人，一有机会就背生词，注意听别人讲，不会就问，不怕出丑；有机会就用藏语说，错了再改，反复练习纠正。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学习，她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藏话，为她在西藏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50年前，随着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叛乱后，中央决定在平息西藏叛乱的同时，进行民主改革。此时，农奴要求改革的热情很高，但对改革的意义、方针政策和方法知之甚少，需要对他们进行启发帮助、教育引导，特别是对积极分子进行培养。中共西藏工委很重视这项工作，创办了很多训练班。江孜分工委于1959年7月在江孜镇郊区仲吉林卡办了一个政训班，主要是培训农牧区（含城镇）在民主改革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基层干部和党团员。李国柱是这个政训班的主要负责人。最初是她一人负责，同时兼做辅导、翻译、管理等工作，后来调来其他同志协助她一起办班。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国柱和同事们克服了办班场地条件不好、生活困难、没有教材、藏族学员基础差等很多困难，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亲自办了约15期培训班，共培训两千多人，使学员们懂得了很多新鲜的革命道理，思想产生了飞跃，政治热情高涨，成了基层工作的骨干，为民主改革培养了大量人才。

再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是她带工作组在亚东县嘎林岗乡（边境地区）蹲点的事。当时，是为贯彻中共西藏工委《关于目前边境工作的指示》（即《边境十条》），她和工作组在嘎林岗乡蹲点时，组织当地基层干部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访贫问苦，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发动群众；贯彻落实政策，解决实际问题。国柱同志在那里坚持了一年多，最后因饮用水缺碘患上了当地人常患的粗脖子病，还染上了肺结核病，以至于粗脖子病后来虽做了手术，至今也未痊愈。一个女同志，能在斗争复杂、生活艰苦的





边境地区，带领工作组，在一个点坚持那么长时间，这在江孜分工委是唯一的，在全西藏也是少有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作组积极有效的努力工作，使嘎林岗乡发生了很大变化，稳定了群众情绪，制止了群众外流现象，使当地生产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党的政策在边境地区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至今她当年的房东女儿还和她保持着联系。

忆往昔，峥嵘岁月。国柱同志在西藏的工作经历很丰富，在机关和农村都工作过，并在基层蹲过点，任过机关干部、秘书，担任过一些重要任务的负责人，和西藏的上层人物、基层干部、农奴群众都有广泛的接触，协助领导或独立承担并完成很多重要事务的处理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很多实际有意义的工作和精彩的故事。

这本《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是国柱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她自己所作记录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忆整理撰写而成。每一件事，都是她亲身经历的，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她在西藏几十年来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可以说，这本书既是她对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那段时光的回顾，也是她在西藏工作几十年践行而得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体会的结晶。这些亲历亲闻的事情，虽是局部的，又多属事件的一个侧面或片断，但这些鲜活生动的事例，犹如一块块“活化石”，以小见大，可以管窥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为我们研究西藏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生状态的第一手资料或线索。

国柱同志在这本书里，撷取一个个独立的事件单独成篇，作为珠，以情为线，串成精美的项链，充分表达了她对西藏无比炙热、难以割舍的情感。书名取为《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从情处着眼，以事寓意。书中选取的她从进军开始到参与西藏革命和发展建设的每个历史阶段所经历大事小事，无不充溢着她风风雨雨、激情飞扬的近六十载的西藏情怀。正是这种对西藏深深的眷恋和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她即使调离了西藏，甚至是退了休，仍然关心西藏不止，研究西藏不止，奉献西藏不止。这么多年





来，她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到关注西藏的发展和建设事业中，参与到藏学研究行列，凡和西藏有关的书籍报刊和信息都极为注意和留心，广为涉猎，记笔记，收集每条有价值的资料，整理史料，为现实工作服务。也可以说，她的这本《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不仅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藏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也是她自始至终关注西藏、情系西藏，树立了长期建藏牢固思想的人生写照。

我希望，当年参加过进军西藏的老兵和关心西藏以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在受益之余作出补充和纠正。

2009 年 5 月



自述

我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烽火年代，刚记事就目睹了日寇对我国重庆市民的连续大轰炸。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机共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当时重庆市区满街都躺着尸体，树枝上挂着人的肠肚，处处都能听到同胞找寻亲人的哭叫声。我们所住的郊区虽未被炸，但房子摇动，玻璃破碎，不敢入住，还经常看到市内被炸的惨景，听到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为躲避轰炸，经常整夜睡在室外的野山坡上。

我国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大批机关、难民也随之南迁。我家所在的歌乐山镇住满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大学、中学、医院和大量外省人。我们与他们为邻，歌乐山政府为难民中的孤儿开办了三所保育院和小学、中学。当时我家因子女多，家境贫穷，上不起学，父亲趁机将我们兄妹五人送进为难民办的免费幼儿园、中小学，即“振济幼儿园”“振济小学”，那里的同学都是失去亲人的孩子。学校教唱的歌、演的文艺节目都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大豆高粱，还有那年迈的爹娘”，“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之类内容，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演出，他们哭我也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爱我中华的种子。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机关迁回南京，学校解散停办，我转学到基督教徒办的“广益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宣传美国的文明、基督教神圣之类的内容，并规定六年级开始学英语，星期天住校学生要求统一做礼拜。我不住校，为得到彩色歌片，偶尔也参加礼拜。

在这个学校又读了一期，小学毕业后，考入歌乐山脚下的育英中学。这里离家 40 华里，学校规定学生品学兼优者，前三名可减免学杂费。我刻苦学习，每期都是前三名。在初一年级下学期结业时，因我是班上的经济委员，结账时我发现学校有贪污现象，我们几个经济委员商量后发通知转告同学，在通知已刻成蜡版，即将付印时，高年级的男生不准印发，并威胁说：“如查不出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李国柱负责。”这时我害怕妥协了，通知



1948 年冬于重庆歌乐山相伯中学。第三排右二为作者





没发出去。初二年级开学时，学校宣布我成绩为优等生、品行为乙等生，不能免学杂费。同学们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父母也不知道，万一知道后也不知会如何处置我。在面临辍学危机时，我向已工作有收入的大哥求援，他理解我的处境，慷慨解囊相助，既免于辍学，又掩人耳目。这次斗争的失败，让我领悟到政府机关贪污腐败、官官相护，更加深了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憎恨。

初二下学期我转学到离家 100 多里的乡村，在姑妈金永华、表哥王朴校长办的志达中学（原名莲华中学）上学。学校是共产党地下党办的，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教的内容很新鲜，图书都是进步的、苏联的，唱的歌是解放区的，我在这里初步受到革命的影响，开始写作文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可是后来被国民党当局发现，校长王朴被捕，老师转移，进步图书全部转入地下。父亲害怕我们受影响，坚决不准我们姐妹俩继续在那里上学。我们虽留恋那里的一切，也只能遵从父命，转学到歌乐山附近的相伯中学，读了两期至初中毕业。这个学校是天主教徒办的，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活动得很厉害，共产党地下党也在学校活动，双方争夺青年。我当时也有选择地参加了学校进步老师胡元臣（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看过他向领导写的信中曾提到准备发展进步学生李国樑和李国柱兄妹入党的文字）主办的相伯合唱团，唱进步歌曲，还参加了进步学生办的几何社，写文章，出墙报。

人的一生，长身体关键是在青少年时期。从我懂事时起，家里就不富裕，既无房亦无地，靠租房住，所以经常搬家。全家靠母亲在镇上开小面馆，维持一家老少十几个人的生活，母亲经常为断炊发愁。我们吃饭多数是素菜、咸菜，有时吃客人的剩饭菜。上学时一般吃两顿，中午饿着不吃饭，有时大人给一毛钱买一碗面条。放学时沿途采些猪饲料，回到家立刻干家务活，洗菜洗衣服，做完家务后才能做作业。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吃饭，再背着小弟弟一块上学。因缺乏营养，曾在周一集体聚会做“纪念周”时，站不稳晕倒过两次。下雨天怕湿了鞋没换的，就脱鞋





光脚走。由于家中经济困难，父母让大哥 13 岁出去当学徒后当兵，还把我和三哥国樑过继给有钱人家当干儿子干女儿，弄点钱和衣服。我过继后改名换姓，定期去那家拿取他家孩子不穿的衣服。三年后，我自己把姓名又改了回来。我们隔壁不远是政府粮店，在装卸粮食时，经常会漏些米在地上，我们兄妹经常等着去扫米，淘洗后煮饭吃。生病没钱买药是常事，记得有一次发高烧，烧得天晕地转，一连烧了几天，就喝些土茶水才慢慢缓过来……这就是我青少年时的真实写照。

青少年时期匆匆过去，1949 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已是年满 17 岁的大姑娘，面临择业还是继续升学。父母意见：如果能考上免费学校就继续上学，希望我报考护士学校，工作有保证，能挣钱糊口。后因凑不齐考护校的条件，如必须有带秒针的手表、一套白衣、一双白力士鞋等，只能作罢。剩下的唯一出路，是报考师范学校（免学杂费、食宿费，发校服一套）。

后来得知当年全重庆市仅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师范部招 30 名考生。我横下一条心，决心考进去。那些日子我临时住在外婆家，安上电灯，苦心攻读“升学指导”等有关书籍，奋战一个多月，人瘦了很多。考试结束后，在《重庆日报》上发榜，我被录取了，排在第 25 名。我看后高兴得跳起来。谢天谢地，真不容易！据我所知，歌乐山小区同龄女生中仅我一人被录取。

8 月末，我背着行李去学校报到，学校在距离家 100 多里的北碚。报到后，老师首先宣布学校纪律，用剪刀将头发剪至耳垂以上，发给一套校服（深蓝色长旗袍，左上角绣有“国立女师附中师范部”字样），并规定平时一律穿校服，上体育课时穿长裤。全校学生一千多人，共同特点是家境较贫困，易于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校长是国民党党员，对学生管理很严格，就这样也挡不住学生间进步思想的传播。记得入学不久，我的言行引起高年级大龄学生的注意，学生会负责人戴国芬两次找我单独谈话，让我参加他们这个共青团外围组织，我表示可以参加活动。当时，





在国民党、三青团密布的校园里，从事进步活动谈何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招来开除之灾。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学校的环境，见的想的多了，看到市场物价天天飞涨，学校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从四个菜降到两个菜、一个菜，最后只能吃辣椒盐水泡饭。群众生活更苦，怨声载道，街上乞讨、卖儿卖女、偷盗现象也增多，而政府官员却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管百姓死活。中国怎么办？中国将向何处去？谁能拯救中国？各种问号填满脑中，也看不到别的书报，整天闷闷不乐，也不能公开同别人探讨。

三个月过去了，情况发生了突变。11月下旬的一天，学校紧急通知，全体学生集合，打着小红旗排队，到江边码头欢迎国民党军队，美其名曰是胜利归来，其实是败退。又过两天，学校再一次紧急通知，全体学生集合，打着小红旗排队，到江边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见解放军同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群众敲锣打鼓，欢迎亲人，情绪很激昂，北碚宣布解放了。

解放之初，由于群众受谣言蛊惑，一时间大街上商店关门闭户，行人很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总之像时钟似的，一切停摆，像个死城。为了改变现状，揭露谣言，戴国芬等大龄同学组织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开展针锋相对的宣传。我们根据解放军的布告、各种政策、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精神，编成短剧和秧歌在街头、工厂、农村宣传演出、演讲。我个子高，每次都演男角。我还到相辉学院去演讲（国樑兄在那里就读，他后来还为此写过文章谈及此事）。经过强大的宣传攻势，群众解除了顾虑，商店开了门，工厂开了工，学校复课了。这时我看到解放军张贴的招生广告：军政大学招收女兵，真高兴，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不交学费、管吃管穿，就立即报考了十二军军政大学。经两次口试、一次笔试后，我被录取了，心情无比激动——今后再也不会为吃穿、交学费发愁了。

此时此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感谢亲爱的母亲，是她摒弃世俗偏见，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养育女儿上学识字，打下文化基础，我才能走进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还要感谢共产党、解放军解救





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也救了我这个穷学生出苦海。我庆幸拨开乌云见太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在解放军大学这座熔炉里学了半年，经受了锻炼，改造了旧思想，学到了革命知识，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奠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毕业分配时，我放弃留在大城市重庆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加入解放西藏的行列。

从1950年进藏到1972年离开，我在西藏一干就是23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会了藏语，学到了西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更加热爱西藏，树立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在高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养育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本想让她们继承我们的事业长期建藏，还给她们取了象征汉藏民族团结的名字，不料她们生下来就不适应我们工作的西藏江孜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气候，没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后来，她们长期在内地生活、学习，我们长期在西藏工作，她们从小就没能享受到家庭温暖，这也是我们无法弥补的遗憾。

回顾在西藏工作的23年，概括起来做了两件事：

1. 贯彻《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称《十七条协议》）。开展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西藏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也做了一些影响群众的工作，如发放农贷等。

2. 参加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斗争。搞调查研究，下乡蹲点和培训基层干部。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即“文化大革命”中，1972年法唐同志突然调离西藏。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雪域高原和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以及和我们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

离开西藏到内地后，我先后调动了三个地方。第一站是1972年5月到福建省委宣传部；第二站是1976年8月到山东省委宣传部；第三站是1980年12月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直至退休。也就是说，从祖国的西南边陲到东南沿海，最后来到祖国

